

新时代下的乡村旅游研究再思考

徐虹 王彩彩

(南开大学旅游与服务学院 天津 300350)

摘要: 新时代为乡村旅游发展带来重大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要求和挑战。大力提振乡村旅游,科学引导乡村现代化发展,是我国解决“三农”问题和实现乡村振兴的重大现实需求和重要科学命题。笔者基于对乡村新现象的观察,提出新时代背景下乡村旅游研究的关键问题,分别从数字经济下乡村旅游运营模式、休闲经济下乡村旅游市场开发、创新经济下乡村旅游创业、包容性经济下乡村旅游扶贫和绿色经济下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5个视角提出乡村旅游的研究问题,继而指出未来乡村旅游发展需要实现主客观、资源观、制度观3个方面的思想转变,并提出乡村旅游研究的整合框架,以期通过深化理论研究和强化实践应用,推动乡村旅游提质升级。

关键词: 新时代;乡村旅游;理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 F59

Doi: 10.12054/lydk.bisu.7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238(2018)03-0020-21

一、新时代乡村旅游研究的新观察

乡村旅游作为旅游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已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发展潜力。随着乡村旅游的蓬勃发展,国内外学者对乡村旅游的研究内容和关注议题越来越广泛,取得了较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笔者通过对近十年的乡村旅游研究文献梳理,发现已有研究主要聚焦在对乡村旅游概念的讨论(何景明、李立华,2002;郭焕成、韩非,2010),从乡村旅游产品(唐代剑、黎彦,2010)与旅游资源(尹占娥、殷杰、许世远,2007)以及消费者行为特征(粟路军、王亮,

[收稿日期] 2018-03-22; [修订日期] 2018-04-24

[基金项目] 本文受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金项目“双创环境下京津冀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019520017)和国家旅游局2017年度研究型人才培养项目“包容性发展下乡村旅游脱贫机制与路径研究”(WMYC20171020)资助。

[作者简介] 徐虹(1963—),女,天津人,南开大学旅游与服务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旅游产业经济与目的地竞争力、旅游服务创新与战略管理。王彩彩(1989—),女,山东烟台人,南开大学旅游与服务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乡村旅游与旅游产业。通讯作者。E-mail: wangcaicai621@163.com

2007)方面探讨供需问题,对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邹统钎,2008;廖慧怡,2014)和社区参与问题(翁时秀、彭华,2010;杜宗斌、苏勤,2013)的分析,从利益相关者视角(古红梅,2012;周春发,2012)以及新农村建设、旅游扶贫、城乡统筹等政策视角(孙冬玲、张黎、舒伯阳,2007;黄郁成,2011;陈秋华、纪金雄,2016)对乡村旅游的探讨等方面。研究成果呈现出紧密联系国家政策、多学科融合、多角度切入等特点,从理论及实践上都对乡村旅游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引作用。

目前,我国已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关键时期,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同时,大会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但现在我国乡村社会存在农业生产要素非农化、农民社会主体老弱化、村庄建设用地空废化、水土环境污染化、贫困片区深度贫困化问题,这“五化”问题限制了乡村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乡村地区出现新的经济业态和社会发展趋势,伴随着乡村休闲农业、田园综合体、特色小镇等新形态的出现,乡村主体培育、乡村社会治理、乡村文化建设、乡村环境保护等迫在眉睫,让“创业、创新、创意”的活力竞相迸发是解决乡村问题的关键。故此,随着我国乡村进入新时代的发展阶段,迫切需要以创新的理念、创业的魄力、创意的方式重新审视新时代乡村“五位一体”全面发展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深化理论研究,发挥理论指导实践的积极作用。

乡村旅游作为新时代农村经济发展模式转换、产业结构升级换代的有效方式,是促进乡村社会进步、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产业,实践中乡村旅游迫切需要转型升级,其理论研究也将面临诸多更加复杂的科学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既是乡村旅游实践发展的需要,也是理论研究创新的突破口。就乡村旅游研究而言,虽然国内学者已在乡村旅游领域进行了大量探索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但应用性重复研究较多,理论性创新探索较少,在科学问题的凝练和深度探究、研究方法集成和创新应用、学科间的交叉和系统融合方面仍需加强(黄震方、陆林、苏勤等,2015)。学界有必要对新时代背景下的乡村旅游研究进行反思,将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相结合,指导乡村旅游突破发展困境。因此,笔者结合新时代背景下我国乡村社会出现的系列问题,对数字经济、休闲经济、创新经济、包容性经济以及绿色经济新形态下乡村旅游的关键研究点进行梳理,以期引发学界和业界的共鸣,对学者重新审视乡村旅游的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二、新时代乡村旅游研究的关键问题梳理

1. 数字经济下有关乡村旅游运营模式问题的思考

2017年3月，数字经济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受到广泛关注。数字经济的出现，孕育了新的消费模式，推动全球产业整合与升级，催生出新的生产模式（何泉吟，2013）。已有研究分析了数字经济背景下税收管制问题（崔晓静、赵洲，2016；杨晓雯、韩霖，2017）、国家发展战略（逢健、朱欣民，2013）、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张雪玲、焦月霞，2017）等，多聚焦于国家宏观层面，对中观产业、微观企业的研究较少。如今，互联网成为数字化时代的重要标志，对乡村旅游产业提出了新挑战，要求乡村旅游的运营模式进行变革和创新。实践中，乡村旅游的不同发展主体积极融入“互联网+”智慧模式，表现为：一方面，互联网企业进军乡村旅游市场打造乡村旅游网络化平台，争夺O2O（从线上到线下）市场，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重塑乡村旅游新生态；另一方面，原国家旅游局（现文化和旅游部）实施《“旅游+互联网”行动计划》，推动智慧旅游乡村建设，旨在通过互联网，提升乡村旅游的管理、服务和营销水平，各级地方政府也积极响应探索“互联网+乡村旅游”的模式，期待乡村旅游实现质变发展。这些期望及目标的实现要求乡村旅游运营模式在理论研究中有所突破性进展，以进一步促进乡村旅游的实践升级。

（1）主体数字脱贫与运营模式

数字贫困的概念源自数字鸿沟。最早关于数字鸿沟的定义来源于美国国家通讯与信息管理局（NTIA）在1995年发布的报告（周向红，2016）。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把数字鸿沟定义为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层面上，接触并获取信息与通信技术的机会和在活动中使用互联网的频率，在个体、家庭、商业组织、地区和国家之间存在着差距。数字鸿沟是不同主体在使用信息通信技术获取和利用信息资源上存在差距所造成的信息贫富分化问题（李昭晖，2010）。从本质上讲，数字鸿沟是由于信息获取和利用的不公平所导致的，而获得信息的效益、效率较低的主体则成为数字贫困者。我国与发达国家、我国各地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数字鸿沟（尹静、吴荣、朱静，2014），这已严重影响到我国乡村旅游在数字经济下的健康发展，发展主体的数字脱贫问题在乡村旅游运营模式中的重要性不容忽视。

我国一些农村地区尚处于数字贫困状态（闫慧，2013），严重阻碍了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和农业产业创新，因此信息的获取和使用已成为数字脱贫的

重要领域。数字鸿沟既包括基础设施接入层面的鸿沟,也包括数字素养方面的鸿沟(司晓、孟昭莉、王花蕾等,2017),数字鸿沟又会带来互联网红利和互联网资本的差异(邱泽奇、张树沁、刘世定等,2016)。与此相对应,旅游数字扶贫也包含着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民获取及使用信息的教育两个方面。在政府的支持和帮扶下,单个乡村旅游发展主体在数字化方面的基础设施接入设备已基本解决,宽带网络升级、互联网普及率得到提高,但实践中乡村旅游主体普遍存在数字贫困的问题,发展主体的数字素养能力有待提升(吴太胜,2007;周菲菲,2016)。已有研究针对数字鸿沟和数字贫困的研究框架、新农村建设中数字贫困的现状及解决路径进行了探索(吴太胜,2007;周向红,2016),但尚未发现有乡村旅游情境下的数字脱贫研究。已有学者采用教育投入指数、大学生指数、有线电视接入指数、宽带接入指数、移动电话指数等指标测度数字贫困(周向红、王琳,2017),但具体到乡村旅游运营中,发展主体的数字素养具体有哪些表现?他们克服数字鸿沟存在哪些障碍?数字脱贫的影响因素是什么?如何摆脱数字贫困?各主体在数字脱贫中的职能和作用是什么?发挥这些职能和作用的机制是什么?此类问题亟待引起重视。

(2) 运营模式数字化管理与创新

数字经济的本质在于信息化,它要求乡村旅游数字化运营模式在关注发展主体数字脱贫的问题之外,还应当考虑整个数字化运营模式的管理和创新。传统上,乡村旅游采取的运营模式有政府主导型、社区参与型、合作组织引领型,抑或是“政府+社区+农户+合作组织”的模式。如今,在数字经济下,互联网技术为乡村旅游运营模式提供了便捷、高效的发展机会。已有研究对旅游业数字化运营问题的讨论聚焦于数字化平台建设,学者探讨了遗产旅游(李杨,2015)、红色旅游(黄细嘉、龚志强,2007)、星级酒店(朱环,2014)、旅行社(郑四渭、方芳,2013)等的数字化平台运营模式与路径,研究表明,旅游业中数字平台建设亟待整合与创新。但学者对乡村旅游的数字化运营平台建设问题较少涉及,实践中,乡村旅游的数字化建设情况不容乐观,乡村旅游的数字化运营平台亟需建设。那么,与其他旅游业态相比,乡村旅游的数字化平台建设有何独特性?这一平台如何发挥作用?怎样创新其运行模式和机制?乡村旅游数字化运营模式中各方利益主体如何发挥作用?他们之间的作用关系如何?制约各方主体作用关系的因素有哪些?如何对数字化运营模式进行预测和管理以构建动态的运营模式?影响运营模式创新的因素有哪些?如何为乡村旅游数字化运营平台提供政策扶持、制度创新?对此类问题的回答,有助于突破乡村旅游发展的现实困境,并促进乡村旅游理论研究的进步。

2. 休闲经济下有关乡村旅游市场开发问题的思考

休闲经济着眼于人的休闲消费、休闲心理、休闲需求和休闲行为,以满足人们多样化和多元化的发展为目的,体现了新时代人们意识、心理、行为等一系列特征的变化。在这一经济形态下,人们的消费理念开始从注重物质消费向注重文化和精神消费转变,从追逐于城市生活向体验乡村休闲、度假转变,由此,带来了乡村旅游开发的热潮。中央一号文件多次提及“乡村旅游”,例如,2016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大力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2017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强调“大力发展乡村休闲旅游产业”。休闲经济下,“休闲”二字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扩展,游客对乡村旅游不再满足于旅游观光,更希望实现乡村休闲度假、体验乡村慢生活方式。游客对乡村旅游市场开发的创新性要求与日俱增,使乡村旅游市场开发呈现出新机遇和新挑战并存的景象。已有研究探讨了农村休闲经济的发展条件(刘邦凡、张向前,2008)、乡村休闲产业的发展举措(王景全,2010),从提高乡村旅游主体的管理水平、融入文化元素、突出乡村特色来进行乡村旅游营销推广(罗晓彤,2016)。但结合休闲经济分析乡村旅游市场开发问题的研究较少,亟需学界根据休闲经济特征,从全新的视角审视乡村旅游市场开发问题。

(1) 乡村旅游产品创新

只有创新乡村旅游产品供给,才能满足休闲时代大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从历史的视角来看,旅游发展伴随着大量产品创新。从创造包价旅游的托马斯·库克旅行社,到将电影与主题乐园结合的华特迪士尼公司,这些针对旅游消费的产品创新,堪称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突破性创新。由于旅游产品可以从单一性产品和综合性产品角度来理解,旅游产品创新研究有从企业层面探讨单一品质创新的,如美食、设施、健康等(Jacob, Tintoré & Aguiló, et al., 2003; Pikkemaat, 2008),定制化服务(Enz & Siguaw, 2003)和环境措施(Le, Hollenhorst & Harris, et al., 2006);也有从目的地层面探讨旅游项目创新的(Clydesdale, 2007)。然而,相较于传统经济学,休闲经济更强调以人为本,要求将游客需求放在第一位,使生产者 and 消费者进行互动沟通,共同创造体现乡村性、本土化、差异化的乡村旅游产品。因此,笔者认为可以从两个新视角思考乡村旅游产品创新问题。

一是考虑基于价值共创的乡村旅游产品创新研究。服务主导逻辑认为价值由顾客和企业共同创造(Vargo, 2011),并将价值共创作为命题假设,但对于价值共创的过程并没有给出具体解释(钟振东、唐守廉、Pierre, 2014)。纵观已有文献,较少有旅游产品开发中的价值共创研究视角。那么,城乡融合发展

背景下乡村旅游产品开发如何与游客进行价值共创来带动产品创新? 旅游产品供给方与游客进行价值共创的模式与过程是什么, 双方共创旅游产品的互动机理是什么? 供给方与游客进行价值共创受到哪些因素影响? 这些都有待进行深入探讨。二是基于慢生活理念的乡村旅游服务供给研究。“慢旅游”成为乡村旅游地吸引游客的最大亮点, 而目前慢旅游的理论研究深度和实践广度都有待提升(闫红霞, 2013; 王琳霞, 2016)。慢旅游提倡慢生活, 在慢生活理念下乡村旅游的产品与服务供给需要进行怎样的变革和创新? 乡村旅游产品、服务应如何与慢生活进行匹配? 这些产品供给与慢生活的匹配度受哪些因素影响? 在慢旅游推动下乡村旅游服务场所的空间结构如何演变? 乡土性的慢生活场景如何构建? 这些问题都需要深入分析。

(2) 乡村旅游市场细分

休闲经济时代, 游客更加注重旅游过程中的自我体验、欣赏价值、情感表达等, 由此传达出有关消费需求的信息, 需要旅游供给者根据游客的偏好进行市场细分, 开发符合游客需求的旅游产品。已有研究按照人口统计特征对旅游市场细分进行了较多探讨(肖飞、沈雪梅、张骏等, 2010), 尤其是针对儿童、银发族等市场的产品开发、营销推广问题(于艳、黄震方, 2009; 伍海琳, 2011; 周刚、张嘉琦, 2015)。也有学者从消费者行为(舒伯阳, 2003)、旅游动机(陈德广、苗长虹, 2006)、旅游态度和偏好(许峰, 2008)、活动偏好(梁江川、张伟强, 2009)等角度进行了旅游市场细分的研究。由于旅游者所处社会阶层、生活方式以及个性的差异, 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细分市场, 但此方面的研究较少(张波, 2009)。在休闲经济时代下, 学界和业界应该寻求新的乡村旅游市场细分标准, 为不同的旅游者提供有针对性、个性化的旅游产品和服务。根据游客的不同兴趣爱好、心理特质以及生活方式对乡村旅游市场进行细分研究, 汲取发展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研究范式和理论依据, 开发多元化、体验化的乡村旅游产品。比如, 按照不同兴趣爱好、生活方式细分的游客市场具有怎样的人口特征和行为特征? 产生这些差异特征的影响因素有哪些? 这一市场细分标准具有哪些细分指标? 由此带来的产品开发路径是如何构建的? 这一市场细分标准下游客的乡村旅游意向如何? 此类问题都值得通过实证研究来探讨。

3. 创新经济下有关乡村旅游创业问题的思考

创新经济是以技术创新、人力资本、高新技术和信息技术为重点的经济发展的新形态(戚文海, 2007), 当前, 由市场需求与技术进步双轮驱动的创新经济时代已经到来。目前学者对创新经济的研究聚焦在国家与地区创新经济发

展（邢国繁，2012；徐从才，2012；张迎红，2012）、创新经济体创新效应（崔维军、陈凤、罗玉，2014；胡贝贝、王胜光、张秀峰，2017）、创新经济增长（房汉廷，2015）等主题。已有研究多从宏观、中观层面对区域创新进行讨论，然而，创新实践中离不开微观层面创业实体发挥的角色作用，因此，在创新经济形态下，乡村旅游创业的新现象、新趋势值得学界关注。2015年，“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简称“双创”）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成为国民经济改革的重要战略手段之一。目前，乡村旅游创业从内容和过程上都呈现出新的发展特点，在创业主体、创业形式、创业环境等方面的内容得到延伸，需要学界对乡村旅游创业的理论研究作出新思考。

（1）创业主体与机会

创新经济下，乡村旅游创业鼓励普通民众发挥能动性和创造力，自愿地参与创业活动，实现个人价值。由此，新时代乡村旅游创业主体呈现出主体多元化、普遍化的特点，一大批返乡人员、乡村女性、大学生凭借自身能力和经验开展创新创业活动。已有研究发现，返乡人员、女性形成了乡村旅游创业的主体（Getz & Carlsen, 2000；Getz & Petersen, 2005），那么，不同类型的创业者适合进行哪种类型的创业活动？创业主体开展创业活动需要具备哪些创新特质、特征？创业主体如何在创业活动中实现创新，受哪些因素影响？此类问题都需要进一步探讨。创业者身份、创业特质对创业机会的识别至关重要，创业机会识别是整个创业过程的起点，是创业者进行一切创业行为的前提。创业机会既可以是被发现出来的，也可以是被构建出来的，或者二者兼之，要求创业者具有机会识别与发现的能力、不确定性应对与把控的能力以及团队领导力（斯晓夫、王颂、傅颖，2016）；机会构建要求创业者具有质疑、观察的行为习惯（Dyer, Gregersen & Christensen, 2008），以及社交技能（Fligstein, 2001）等。对于乡村旅游而言，在科技创新、市场创新、制度创新的驱动下，创业者如何寻找创业机会、怎样借助要素创新开始创业活动？哪些因素影响创业者发现创业机会？创业机会识别的形成机制是什么？这些都是有待探讨的问题。

（2）创业形式与效果

创新经济不仅要求创业过程中实现技术创新、资源创新、市场创新，还强调创业形式、创业效果的创新。乡村旅游创业不能局限于经济绩效，更应该重新审视乡村旅游创业的社会价值，重视乡村旅游社会创业及其社会效应，因此，乡村旅游社会创业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从创业动机和目的出发，社会创业是一个创新地利用身边的资源以满足社会需求、解决被忽略的社会问题的过程（Ratten & Welpe, 2011），它强调经济利益和社会福利的均衡。从创业绩效

构成来看,社会创业是利用商业手段创造社会价值和经济利益的机制(Austin, Stevenson & Wei-Skillern, 2006)。迄今,乡村旅游社会创业的相关问题鲜有涉及,那么,在乡村旅游创业中,经济利益和社会福利是如何实现的?在哪些情况下能够实现?创业企业与各利益相关者在其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社会企业的成长路径是怎样的?其影响因素、动力机制是什么?此类问题值得深入探讨。

(3) 创业制度与政策

创新经济形态要求旅游产业随着时代背景、经济环境、市场需求的变化进行制度变革和创新,乡村旅游创业更是如此。近年来,各级政府针对乡村旅游创业出台了各种规章制度、优惠政策,以期带动乡村经济和社会的进步,实现乡村振兴。实践表明,相关制度保障已取得显著成效,推动了一批乡村旅游创业活动,但在土地、资金、人才等方面仍需要制度与政策环境支持。一方面,乡村地区的旅游创业离不开政策扶持、制度创新。新时代下乡村旅游创业所需的土地、资金、人才等如何落实和变通,乡村旅游创业受哪些制度性因素的制约,政府需要在哪些方面进行政策倾斜和制度变革,制度环境对乡村旅游社会创业的作用机制是什么,制度感知对社会创业行为有哪些影响等问题都有待深入分析。另一方面,乡村旅游创业者如何适应、改变现行制度或创造新制度为个人创业提供有力的环境支持,决定着旅游创业能否顺利进行,从此角度看,乡村旅游制度创业将成为一个必要的研究课题。已有研究对制度创业过程的划分可归纳为建立变革基础阶段、理论化新制度阶段及推广新制度阶段(Greenwood, Suddaby & Hinings, 2002; Maguire, Hardy & Lawrence, 2004)。在乡村旅游发展中,制度创业的过程与机理是什么?有何特殊性?制度创业的驱动因素与机制是什么?各利益相关者之间是如何互动、博弈的?乡村非正式制度对创业过程产生怎样的影响?这些问题迄今较少涉及,未来可以深入探究。

4. 包容性经济下有关乡村旅游扶贫问题的思考

包容性经济作为新时代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一种新形态,要求树立包容性发展理念,强调经济持续、机会均等、公平参与、成果共享。发展理念上,包容性经济强调由关注“物的增长观”转向关注“人的发展观”;发展目标上,由“部分人”富裕转向“全体人民”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成果;实施行动上,包容性经济强调“参与”和“共享”两个层面。然而,目前广大农村地区在实现人的发展、公平参与经济和共享发展成果方面还远远不足,截止到2017年末,尚有3 000多万贫困人口。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确保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做到脱真贫、真脱贫”。实践表明,乡村旅游作为一种有效的产

业扶贫方式，对实现精准脱贫、鼓励贫困人口积极参与和共享旅游发展红利具有重要作用。因而，新时代要以包容性发展为指导，把握乡村旅游扶贫的新特征，考虑扶贫内涵的多维性、扶贫区域的全方位和扶贫路径的共建性问题。

（1）乡村旅游扶贫内涵的多维性

包容性经济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在扶贫工作中，不仅要减少贫困群体的收入贫困，更要关注其健康、知识、参与、环境等方面的贫困问题。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1997年《人类发展报告》中首次提出“人文贫困”（Human Poverty）的概念，指出贫困不仅仅是收入低微、经济贫困，更深刻的是人们在寿命、健康、居住、知识、参与、个人安全和环境等方面得不到满足，即人文贫困。1999年，Amartya Sen提出基于能力方法的贫困观，将贫困界定为可行能力的剥夺，而不仅仅是收入低下（Amartya, 1999）。随后，研究者从多维视角讨论了贫困的内涵，如健康贫困、权利贫困、知识贫困、信息贫困等来反映贫困人口的生活现状（东波、颜宪源，2010；姚云云、刘金良、东波，2012；姚云云、班保申，2016）。人类的多维贫困反映了贫困人口由基本需要到较深层次需要的未满足状态，在一定阶段，某一维度的贫困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显性贫困问题，影响其他隐性贫困的摆脱。那么，这种多维贫困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乡村旅游扶贫本质上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各维度在乡村旅游扶贫中应该包含哪些指标？各贫困维度的脱贫顺序是什么？受哪些因素的影响？各维度之间的内在作用机理是什么？以上问题在现有研究中较匮乏，值得进一步探究。

（2）乡村旅游扶贫区域的全方位

包容性经济旨在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要求旅游扶贫针对不同贫困区域环境、不同贫困农户状况，对扶贫对象实施精确识别、精确帮扶和精确管理。目前，我国扶贫政策面向的扶贫区域和对象为老少边穷地区的贫困群体，主要聚居在中西部的偏僻山区。调研发现，对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贫困问题依然存在，相较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的贫困群体虽然在收入层面已得到提升，但在健康、知识、权利、信息、环境等层面的脱贫还远远不足（徐虹、王彩彩，2017）。未来，乡村旅游扶贫应该精准到不同区域的不同扶贫内容，这将有助于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解决。在理论研究中，学者选取典型案例对乡村旅游的扶贫现状与困境（陈祥碧、唐剑，2016；张春美、黄红娣、曾一，2016）、扶贫模式（罗云艳，2017；叶晨曦，2017）、扶贫机制（赵武、王姣玥，2015）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但主要聚焦在单一地区的经济扶贫维度，对乡村旅游扶贫区域及扶贫内容的比较分析尚缺乏研究。然而，不同区域的乡村旅游扶贫内容是否有其特殊性？不

同区域的乡村旅游扶贫效应除了经济脱贫外还有何不同? 东部地区的乡村旅游扶贫对西部地区会产生怎样的帮扶效应? 同一地区的乡村旅游扶贫内容是否有阶段性的变化? 如何科学地进行预测? 怎样进行扶贫内容的动态调整? 这都需要理论和实践层面的反思。

(3) 乡村旅游扶贫路径的共建性

包容性经济的核心在于协调、共同发展, 而产业扶贫是一项系统性工程, 由此, 乡村旅游扶贫需要各方利益相关者协同合作、共同发力, 将乡村旅游开发和扶贫攻坚有机结合, 扶持贫困群众参与乡村旅游的经营和服务。在这一过程中, 如何让能力欠缺、资源有限、知识匮乏的贫困人群公平地参与旅游开发、提升自我脱贫能力、获取旅游收益的机会, 使“造血式”扶贫切实落地, 是永久性脱贫的关键。乡村旅游扶贫应当体现共同参与、包容性的共享价值取向, 实现包容性旅游发展, 坚持以人为本, 激发贫困主体的内生动力, 以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为核心, 政府、社会组织、村集体等各方力量联合驱动, 促进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目前, 学者从宏观层面就多元主体参与、资源开发与整合、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对乡村旅游扶贫路径和策略进行了较多讨论(黄渊基、匡立波、贺正楚, 2017; 吴靖南, 2017), 并提出乡村旅游精准扶贫要以可持续发展为理念, 以文化保护、扶贫脱贫、利益共享和空间平等为目标体系, 以内源为动力, 以外援为助力, 把乡村价值嵌于乡村旅游精准扶贫中(李锋, 2017)。但在包容性发展视角下, 乡村旅游扶贫涉及不同利益主体的矛盾与协调关系, 那么, 各主体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 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协调机制是怎样的? 贫困人口如何提升自我发展能力? 其能力提升受哪些因素的制约? 包容性扶贫的路径模型如何构建? 这些问题都值得研究探讨。

5. 绿色经济下有关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思考

绿色经济是基于可持续发展思想产生的新型经济发展理念(郑德凤、臧正、孙才志, 2015), 强调维护人类生存环境、合理保护资源与能源, 追求经济与环境和諧的平衡式发展。学者从实施绿色发展的路径与策略(张莹、刘波, 2011; 孙伟、周磊, 2012), 驱动和制约绿色发展的因素(郭戈英、郑钰凡, 2011; 刘薇, 2012), 推动绿色经济发展的财税改革、政策导向和金融服务(曹东、赵学涛、杨威杉, 2012; 刘莎莎, 2012), 绿色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高春玲, 2012; 张焕波, 2013; 朱海玲, 2017), 绿色经济发展模式(高红贵、刘忠超, 2013)等方面对绿色经济与绿色发展进行了较多的探讨, 旨在促进经济、生态、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然而, 在这一经济形态下, 乡村的绿色发展现状堪忧。乡村旅游发展越来越迅速, 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乡村生态环境污染、旅游资源破坏

和景观损毁现象，成为乡村旅游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正视的难题。因此，在绿色经济背景下如何协调乡村旅游与生态环境的发展，推动乡村旅游与乡村社会、生态的融合发展，将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相结合，显得迫切而必要。

（1）绿色生产与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

在绿色经济形态下，绿色生产成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2017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坚持绿色生态导向，推动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坚持遵循乡村发展规律，扎实推进美丽宜居乡村建设。由此，乡村旅游事业的发展需要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力求寻找与乡村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美丽乡村的契合点，实现乡村生产、生活、生态、生命的共赢，才能实现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已有研究分析了乡村旅游景区绿色发展指数（颜文华，2017）、乡村旅游绿色发展存在的问题与策略（张中奎，2016；唐静、祝小林、王婷婷，2017）、乡村旅游循环经济运行模式（王迎涛，2011）等问题，但鲜见有对乡村旅游绿色生产方式、生产效率的探讨。在理论研究中，如何构建绿色健康的乡村旅游产品体系？如何进行乡村旅游绿色产品的营销推广、品牌建设？乡村旅游的绿色生产评级指标体系如何构建？乡村旅游的绿色生产效率怎样测度？影响乡村旅游绿色生产的影响因素有哪些？乡村旅游实现绿色生产及生态化转型的发展模式、运行机制是什么？乡村旅游如何进行绿色监管和政策制度创新？此类问题都需要进一步探讨。

（2）绿色消费与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

要实现绿色经济下的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除了供给侧发力之外，作为需求方的旅游者应当践行绿色消费观，做负责任的乡村旅游者。那么，在绿色生产的基础上，如何培育、引导游客进行绿色消费就成为乡村旅游需要研究的课题。绿色消费方面学者讨论了选择绿色消费的消费者特征、影响其绿色消费的因素及消费者消费态度和行为的非一致性（吴波，2014），但乡村旅游情境下相关问题的研究较少，有学者考察了乡村民宿的自然环境友好特征对消费者购买意愿的正向影响（魏卫、黄杜佳，2017）。绿色旅游消费行为受收入、受教育水平等个人因素，以及动机、信念和态度等心理因素的影响（Guo, 2001；皮平凡，2004；李祝平，2009），那么，各个因素是如何影响游客的乡村旅游绿色消费意愿和消费行为？其影响程度和方向如何？除了上述旅游者自身因素外，还有哪些外部因素影响绿色消费行为？游客绿色消费感知与旅游体验价值存在怎样的关系？对于此类问题，未来还需要加强量化分析和实证研究。已有研究应用计划行为理论对绿色消费的心理过程、行为影响机制（劳可夫、吴佳，2013）进行了分析，但在乡村旅游绿色消费中旅游者的消费心理、过程存在怎样的特

殊性?其作用机理又有何差异性?这些都值得进一步研究。

三、新时代乡村旅游研究的新趋势

乡村旅游中的上述现象和问题有待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从不同视角、不同理论中发现各自的研究主题,结合乡村旅游的实践考察,做接地气的乡村旅游理论研究。乡村中的人,是乡村旅游顺利开展的核心;乡村中的资源,是乡村旅游赖以发展的基础;乡村中的制度,则是乡村旅游持续发展的保障。因而,笔者认为未来乡村旅游研究中应当重点把握人、资源、制度3个方面观念的趋势转变。

1. 乡村旅游主客观的转变与共融

未来大众游客对乡村旅游的需求不再局限于一种文化消费,更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升级。乡村旅游的存续,应当力求以人为本,实现人的发展。传统意义上,乡村旅游的发展把游客视作消费一方,游客处于被动地位,以致出现了乡村旅游中千篇一律的农家饭、农家窝、农家乐,这种较初级的乡村旅游形式在我国广大乡村地区依然存在,甚至占据主导地位。虽然部分区域已有乡村民宿萌芽,民宿主人也意识到民宿的灵魂在于主人,需要改变主客观念,但在建设过程中仍普遍存在追求设施高档化、服务标准化的现象,导致乡村民宿与大众化酒店差别不大,失去了乡村的特色和本真。在新时代的发展理念下,乡村旅游迫切需要升级换代,真正地为游客提供农家体验、农家乐趣、农家味道;乡村主人需要进行主客观的转变,让游客参与到旅游产品和服务供给中,发挥多元主体共创、共建的优势,让游客共同体验、共同分享乡村旅游的生产与消费价值,使主客关系从量变走向质变,由此从根本上改善乡村旅游市场开发问题。未来,乡村旅游需要首先保证“吃、住、行、游、购、娱”的乡土性、本真性,与游客共融;在此基础上,再向“文、商、养、学、闲、情、奇”的更高目标转变,实现乡村旅游的永续发展。

2. 乡村旅游资源观的转变与整合

迄今为止,我国大部分地区的乡村旅游发展过分依赖于乡村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对资源的认识和开发尚有狭隘性。新时代的乡村振兴战略要求“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这里的“农业”应该理解为“大农业”,即以产业融合的思想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而“农村”发展则包含了人的发展、城乡融合在内的乡村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因此,乡村旅游也应树立基于产业融合、基于多元主体共创的大资源观,为未来的乡村旅游争取更多的机遇和条件。一方面,

从资源整合来看,应大力促进第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进行资源的创意开发,提供综合性的乡村旅游产品和服务,以满足游客的休闲、度假和生活体验需求。其中,作为一种核心资源和要素,在乡村旅游开发中将游客融入到生产活动中,有助于真正做到以人为本、游客导向的旅游供给。另一方面,从城乡资源整合来说,把城市现代化建设中的技术、人才、资金等要素与农村的土地、景观等要素高效结合,补充乡村生产要素的缺陷,可以更好地迎合城市居民对乡村乡愁、青山绿水的向往,最终将形成充分发挥乡村资源禀赋、服务更大范围游客群体的现代乡村产业。尤其是近两年来,旅游特色小镇建设热潮的兴起,在更大范围内为乡村旅游资源整合提供了强有力的依托。旅游特色小镇在一定地域空间内融合了城乡人口、资本、企业、产业,将为乡村旅游未来的发展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机遇。

3. 乡村旅游制度观的转变与创新

主观上,乡村旅游的发展需要人的发展、资源的延展,而客观上更是离不开各种制度的保障和规制。从国家层面看,虽然政府部门积极地出台有关乡村民宿、房车自驾车露营地、田园综合体等各类乡村旅游新业态的法律法规,对乡村旅游活动进行引导和支持,但目前各地的乡村旅游发展仍然面临着土地、资金、人才紧缺的问题。原因在于:其一,土地是乡村旅游发展的载体,但土地使用类型受限,致使企业无法按照预想规划进行建设,一些项目无法实施;其二,资金是乡村旅游发展的动力,乡村旅游业主反映农业项目在发展中最棘手的是投资问题,政府等部门在相关项目的资金扶持力度上有待加强;其三,人才是乡村旅游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大众创业热潮吸引各类乡村主体投入到乡村旅游业,但相关人员的素质和能力堪忧,而单个企业无法吸引优秀人才,国家在人才方面的培训、输送就显得至关重要。此外,除了国家各方面制度的支持和约束,乡村本身还需要进行制度观的转变。在乡村社区、企业内部存在各种正式制度,要求乡村旅游发展主体自觉遵守,然而更为重要的是,乡村社会中非正式制度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乡村旅游发展中,应发挥新乡贤治村的效能,同时,注重各类非正式团体的无形作用,将法治、德治、自治进行“三治融合”,加快乡村旅游的治理。

四、新时代乡村旅游研究的整合框架

综观上文对乡村旅游五大领域研究现状及问题的分析可以看出,五大关键问题以及三个观念之间相互关联,存在密切的逻辑关系(见图1)。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经济领域不断涌现出数字经济、休闲经济、创新经济、包容性经济、绿色经济等新经济形态。在乡村旅游实践中,经济学规律决定了产业发展必须依赖供需双方共同发力、相互推进,同时,在理论研究上,新时代乡村旅游在供需层面也面临着新的研究问题。在休闲经济下,应当考察需求侧的乡村旅游市场开发问题,把握游客对产品的新要求,研究新的市场细分标准。在数字经济下,思考供给侧的乡村旅游运营模式、发展主体的数字脱贫以及运营模式的数字管理显得尤为重要。在创新经济下,乡村旅游的创业主体、创业形式、创业制度等方面已呈现新的特征,值得学界关注。这种创新将推动包容性经济下乡村旅游扶贫脱贫目标和绿色经济下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而乡村旅游扶贫脱贫最终将促进乡村旅游的全面可持续发展。由此,学者需要重新审视乡村旅游扶贫、乡村旅游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研究的新特点和新问题。在这一研究过程中,各类新问题的解决必须进行3个观念的转变和创新,只有形成新的主客关系观、资源开发观和制度建设观,才能为各个细分问题提供正确的方向指引。其中,资源是一切主体、制度、要素发挥作用的前提,资源观的转变和整合是观念创新的基础环节,能引发乡村旅游主客关系的转变和相关制度的变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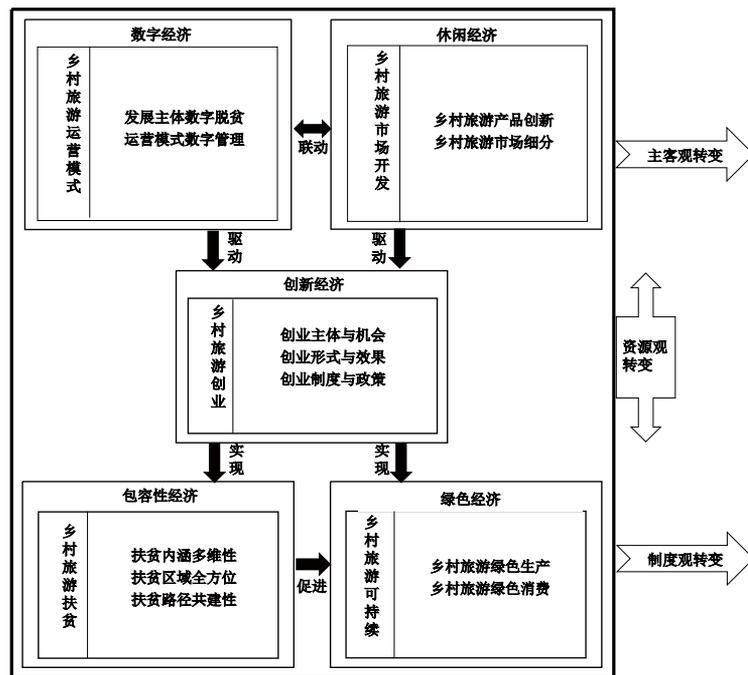


图1 新时代乡村旅游研究的逻辑框架

Fig.1 Logic framework of study on rural tourism in the new era

结束语

本文紧贴新时代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特征,结合乡村旅游的实践需求,提出了数字经济、休闲经济、创新经济、包容性经济和绿色经济下乡村旅游研究中的重要课题。进而笔者在对各个领域研究文献进行回顾的基础上,指出了未来值得关注的研究问题,希望与各位学者、读者共同思考,以期推动乡村旅游理论研究的进步,并指导乡村旅游建设实践。本文同时提出未来乡村旅游发展需要实现主客观、资源观、制度观3个观念的转变,以及乡村旅游研究在五大经济形态下的整合框架,期待切实地转变传统思想对乡村旅游发展的束缚,进行理论与实践发展的碰撞和交融,促进乡村旅游提档升级,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乡村的全面振兴。

参考文献:

- [1] Amartya S. *Development as Freedom* [M] . Oxford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 [2] Austin J, Stevenson H, Wei-Skillern J. Social and commercial entrepreneurship : Same, different, or both? [J] .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2006, 30 (1) : 1~22.
- [3] Clydesdale G. Ski development and strategy [J] .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Planning & Development*, 2007, 4 (1) : 1~23.
- [4] Dyer J H, Gregersen H B, Christensen C. Entrepreneur behaviors, opportunity recognition, and the origins of innovative ventures [J] . *Strategic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 2008, 2 (4) : 317~338.
- [5] Enz C A, Siguaw J A. Revisiting the best of the best : Innovations in hotel practice [J] . *Cornell Hotel and Restaurant Administration Quarterly*, 2003, 44 (5~6) : 115~123.
- [6] Fligstein N. Social skill and the theory of fields [J] . *Sociological Theory*, 2001, 19 (2) : 105~125.
- [7] Getz D, Carlsen J. Characteristics and goals of family and owner-operated businesses in the rural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sectors [J] . *Tourism Management*, 2000, 21 (6) : 547~560.
- [8] Getz D, Petersen, T. Growth and profit-oriented entrepreneurship among family business owners in the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industry [J]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2005, 24 (2) : 219~242.
- [9] Greenwood R, Suddaby R, Hinings C R. Theorizing change : The role of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s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stitutionalized fields [J] .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2, 45 (1) : 58~80.
- [10] Guo G Q. How green products are accepted by different consumer group in China [J] .

- USA-China Business Review*, 2001 (12): 651~676.
- [11] Jacob M, Tintoré J, Aguiló E, et al. Innovation in the tourism sector : Results from a pilot study in the Balearic Islands [J] . *Tourism Economics*, 2003, 9 (3): 279~295.
- [12] Le Y, Hollenhorst S, Harris C, et al.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 A study of Vietnamese hotels [J] .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6, 33 (2): 545~567.
- [13] Maguire S, Hardy C, Lawrence T B. 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hip in emerging fields : HIV/AIDS treatment advocacy in Canada [J] .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4, 47 (5): 657~679.
- [14] Pikkemaat B. Innovation in small and medium-sized tourism enterprises in Tyrol, Austria [J] .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2008, 9 (3): 187~197.
- [15] Ratten V, Welpel I M. Special issue : Community-based, social and societal entrepreneurship [J] . *Entrepreneurship & Regional Development*, 2011, 23 (5~6): 283~286.
- [16] Vargo S L. On marketing theory and service-dominant logic : Connecting some dots [J] . *Marketing Theory*, 2011, 11 (1): 3~8.
- [17] 曹东, 赵学涛, 杨威杉. 中国绿色经济发展和机制政策创新研究 [J] .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2, 22 (5): 48~54.
- [18] 陈秋华, 纪金雄. 乡村旅游精准扶贫实现路径研究 [J] . 福建论坛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6 (5): 196~200.
- [19] 陈德广, 苗长虹. 基于旅游动机的旅游者聚类研究——以河南省开封市居民的国内旅游为例 [J] . 旅游学刊, 2006, 21 (6): 22~28.
- [20] 陈祥碧, 唐剑. 长江上游少数民族地区旅游扶贫实施现状及问题研究——以重庆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为例 [J] . 贵州民族研究, 2016, 37 (4): 147~152.
- [21] 崔维军, 陈凤, 罗玉. 中国与主要创新经济体创新绩效的国际比较——两阶段创新模型的实证分析 [J] .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14, 35 (12): 10~18.
- [22] 崔晓静, 赵洲. 数字经济背景下税收常设机构原则的适用问题 [J] . 法学, 2016 (11): 15~27.
- [23] 东波, 颜宪源. 农村社会工作介入农村反人文贫困的可能性探讨 [J] .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0, 10 (4): 103~107.
- [24] 杜宗斌, 苏勤. 社区归属感对乡村旅游地居民社区参与的影响——以浙江安吉为例 [J] . 旅游科学, 2013, 27 (3): 61~71.
- [25] 房汉廷. STFE 模型: 新资本体系驱动的创新经济增长 [J] . 中国软科学, 2015 (11): 17~27.
- [26] 高春玲. 基于熵值法的湖北省绿色经济发展综合评价研究 [J] . 科技管理研究, 2012 (19): 70~72, 82.

- [27] 高红贵, 刘忠超. 中国绿色经济发展模式构建研究 [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3, 30 (24): 23~26.
- [28] 古红梅. 乡村旅游发展与构建农村居民利益分享机制研究——以北京市海淀区西北部地区旅游业发展为例 [J]. 旅游学刊, 2012, 27 (1): 26~30.
- [29] 郭戈英, 郑钰凡. 我国绿色转型动力结构形成的原因分析 [J]. 科技创新与生产力, 2011 (1): 53~54.
- [30] 郭焕成, 韩非. 中国乡村旅游发展综述 [J]. 地理科学进展, 2010, 29 (12): 1597~1605.
- [31] 何景明, 李立华. 关于“乡村旅游”概念的探讨 [J].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2, 28 (5): 125~128.
- [32] 何泉吟. 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及我国的战略抉择 [J]. 现代经济探讨, 2013 (3): 39~43.
- [33] 胡贝贝, 王胜光, 张秀峰. 创新经济体知识生产中的规模递增效应——基于我国高新区的实证检验 [J]. 科研管理, 2017, 38 (2): 52~58.
- [34] 黄细嘉, 龚志强. 红色旅游数字化综合服务平台的构想及其意义——以江西为例 [J]. 南昌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7, 38 (6): 58~64.
- [35] 黄郁成. 乡村旅游开发对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的作用 [J]. 旅游学刊, 2011, 26 (12): 12~13.
- [36] 黄渊基, 匡立波, 贺正楚. 武陵山片区生态文化旅游扶贫路径探索——以湖南省慈利县为例 [J]. 经济地理, 2017, 37 (3): 218~224.
- [37] 黄震方, 陆林, 苏勤, 等.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乡村旅游发展——理论反思与困境突破 [J]. 地理研究, 2015, 34 (8): 1409~1421.
- [38] 劳可夫, 吴佳. 基于 Ajzen 计划行为理论的绿色消费行为的影响机制 [J]. 财经科学, 2013, (2): 91~100.
- [39] 李锋. 乡村价值嵌入视角下的旅游精准扶贫新考量 [J]. 旅游导刊, 2017, 1 (6): 1~17.
- [40] 李杨. 基于数字平台的非遗旅游资源化创新模式研究 [J]. 包装工程, 2015, 36 (10): 32~35.
- [41] 李昭晖. 论数字鸿沟的产生、发展及消亡 [J]. 情报探索, 2010 (2): 94~96.
- [42] 李祝平. 旅游饭店顾客绿色消费行为研究 [J]. 旅游学刊, 2009, 24 (8): 34~39.
- [43] 梁江川, 张伟强. 基于活动偏好市场细分的旅游产品谱系开发——以开平碉楼世界文化遗产为例 [J]. 旅游学刊, 2009, 24 (9): 36~42.
- [44] 廖慧怡. 基于《里山倡议》的乡村旅游发展途径初探——以台湾桃园地区对乡村旅游转型的需求为例 [J]. 旅游学刊, 2014, 29 (6): 76~86.
- [45] 刘邦凡, 张向前. 论农村休闲经济的开发与城郊休闲经济的发展 [J]. 经济纵横, 2008 (8): 78~80.

- [46] 刘莎莎. 从资源税角度思考绿色经济与绿色财政 [J]. 商情, 2012 (31): 38~40.
- [47] 刘薇. 北京实现创新驱动绿色发展的制约因素与促进机制研究 [J]. 生产力研究, 2012 (12): 126~128.
- [48] 罗晓彤. 休闲经济下乡村旅游市场的开发与营销推广 [J]. 农业经济, 2016 (8): 143~144.
- [49] 罗云艳. 我国乡村旅游扶贫模式创新与实现路径 [J]. 改革与战略, 2017, 33 (9): 97~99.
- [50] 逢健, 朱欣民. 国外数字经济发展趋势与数字经济国家发展战略 [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3, 30 (8): 124~128.
- [51] 皮平凡. 绿色消费与我国旅游业营销战略探析 [J]. 学术交流, 2004 (3): 65~68.
- [52] 戚文海. 创新经济: 经济转轨国家经济发展道路的新取向——以俄罗斯为研究重点 [J]. 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 2007 (6): 48~56.
- [53] 邱泽奇, 张樹沁, 刘世定, 等. 从数字鸿沟到红利差异——互联网资本的视角 [J]. 中国社会科学, 2016 (10): 93~115, 203~204.
- [54] 舒伯阳. 基于消费者行为分析的区域旅游市场规划方法研究 [J]. 人文地理, 2003, 18 (4): 16~18.
- [55] 司晓, 孟昭莉, 王花蕾, 等. 数字经济: 内涵、发展与挑战 [J]. 互联网天地, 2017 (3): 23~28.
- [56] 斯晓夫, 王颂, 傅颖. 创业机会从何而来: 发现, 构建还是发现+构建? ——创业机会的理论前沿研究 [J]. 管理世界, 2016 (3): 115~127.
- [57] 栗路军, 王亮. 城市周边乡村旅游市场特征研究——以长沙市周边乡村旅游为例 [J]. 旅游学刊, 2007, 22 (2): 67~71.
- [58] 孙冬玲, 张黎, 舒伯阳. 乡村旅游与中国新农村建设的互动关系研究 [J]. 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7, 18 (4): 537~541.
- [59] 孙伟, 周磊. “十二五”时期我国发展绿色经济的对策思考 [J]. 湖北社会科学, 2012 (8): 81~84.
- [60] 唐代剑, 黎彦. 论我国乡村旅游产品的特性及其发展方向 [J]. 特区经济, 2010 (1): 162~163.
- [61] 唐静, 祝小林, 王婷婷. 我国乡村旅游绿色发展探讨 [J]. 环境保护, 2017, 45 (2): 62~64.
- [62] 王景全. 统筹城乡发展视角下的乡村休闲经济研究 [J]. 中州学刊, 2010 (5): 59~62.
- [63] 王琳霞. 城郊乡村旅游地慢生活体验区开发研究——以广州为例 [J]. 农村经济与科技, 2016, 27 (13): 89~91.
- [64] 王迎涛. 乡村旅游循环经济运行模式探讨 [J]. 广西社会科学, 2011 (3): 54~57.
- [65] 魏卫, 黄杜佳. 乡村民宿环境友好特征与消费者购买意愿关系研究 [J]. 旅游导刊,

- 2017, 1 (6): 18~33.
- [66] 翁时秀, 彭华. 权力关系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影响——以浙江省楠溪江芙蓉村为例 [J]. 旅游学刊, 2010, 25 (9): 51~57.
- [67] 吴波. 绿色消费研究评述 [J]. 经济管理, 2014, 36 (11): 178~189.
- [68] 伍海琳. 儿童旅游对儿童发展的价值及其市场开发 [J]. 学前教育研究, 2011 (6): 48~51.
- [69] 吴靖南. 乡村旅游精准扶贫实现路径研究 [J]. 农村经济, 2017 (3): 99~103.
- [70] 吴太胜. “数字贫困”: 信息时代新农村建设的现实困境及跨越路径探索 [J]. 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 2007 (6): 120~122.
- [71] 肖飞, 沈雪梅, 张骏, 等. 江苏省台湾客源核心细分市场筛选及旅游资源吸引力相应分析 [J]. 旅游学刊, 2010, 25 (6): 45~50.
- [72] 邢国繁. 关于俄美两国创新经济的对比研究 [J]. 工业技术经济, 2012 (4): 146~151.
- [73] 徐从才. 江苏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创新经济发展: 回顾与展望 [J]. 产业经济研究, 2012 (3): 1~8.
- [74] 许峰. 成都国际旅游营销的市场细分与定位研究 [J]. 旅游学刊, 2008, 23 (2): 36~40.
- [75] 徐虹, 王彩彩. 包容性发展下乡村女性旅游创业路径研究——以蓟县农家乐为例 [J]. 未来与发展, 2017, 41 (5): 10~15.
- [76] 闫红霞. 西部地区慢旅游目的地路径构建研究——以成都为例 [J]. 成都师范学院学报, 2013, 29 (6): 106~111.
- [77] 闫慧. 数字贫困社群实现信息社会流动的影响因素研究——一项京津晋沪粤五地调研的实证分析 [J]. 情报资料工作, 2013 (4): 91~96.
- [78] 颜文华. 休闲农业旅游绿色发展路径——以河南省洛阳市为例 [J]. 江苏农业科学, 2017, 45 (17): 301~304.
- [79] 杨晓雯, 韩霖. 数字经济背景下对税收管辖权划分的思考——基于价值创造视角 [J]. 税务研究, 2017 (12): 53~56.
- [80] 姚云云, 班保申. 新常态下我国农村人文贫困识别——“包容性发展”价值理念的阐释 [J].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6, 17 (3): 36~43.
- [81] 姚云云, 刘金良, 东波. 农村反人文贫困的路径选择 [J]. 商业研究, 2012 (7): 170~174.
- [82] 叶晨曦. 我国乡村旅游扶贫模式与发展策略 [J]. 改革与战略, 2017, 33 (10): 141~143.
- [83] 尹静, 吴荣, 朱静. 论数字鸿沟与农村沟通网络的重构 [J]. 山西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4, 13 (7): 728~731.
- [84] 尹占娥, 殷杰, 许世远. 上海乡村旅游资源定量评价研究 [J]. 旅游学刊, 2007, 38

- 22(8): 59~63.
- [85] 于艳, 黄震方. 银发旅游市场的 SWOT 分析与发展对策——以江苏为例 [J]. 江苏商论, 2009(12): 98~99.
- [86] 张波. 基于市场细分的乡村旅游深度发展研究 [J]. 农业考古, 2009(6): 137~140.
- [87] 张春美, 黄红娣, 曾一. 乡村旅游精准扶贫运行机制、现实困境与破解路径 [J]. 农林经济管理学报, 2016, 15(6): 625~631.
- [88] 张焕波. 中国省级绿色经济指标体系 [J]. 经济研究参考, 2013(1): 77~80.
- [89] 张雪玲, 焦月霞.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及其应用初探 [J]. 浙江社会科学, 2017(4): 32~40, 157.
- [90] 张莹, 刘波. 我国发展绿色经济的对策选择 [J]. 开放导报, 2011(5): 73~75.
- [91] 张迎红. 欧盟创新经济现状及未来政策趋势 [J]. 德国研究, 2012, 27(4): 79~91.
- [92] 张中奎. 绿色发展理念下民族村寨的未来发展研究——以贵州黔东南民族村寨为例 [J]. 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34(5): 46~51.
- [93] 赵武, 王姣玥. 新常态下“精准扶贫”的包容性创新机制研究 [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5, 25(11): 170~173.
- [94] 郑德凤, 臧正, 孙才志. 绿色经济、绿色发展及绿色转型研究综述 [J]. 生态经济, 2015, 31(2): 64~68.
- [95] 郑四渭, 方芳. 我国旅行社业数字化平台模式构建研究 [J]. 商业研究, 2013(2): 81~86.
- [96] 钟振东, 唐守廉, Vialle P. 基于服务主导逻辑的价值共创研究 [J]. 软科学, 2014, 28(1): 31~35.
- [97] 周春发. 乡村旅游地居民的日常抵抗——以徽村拆建房风波为例 [J]. 旅游学刊, 2012, 27(2): 32~36.
- [98] 周菲菲. 互联网+时代乡村生态旅游发展策略探析 [J]. 农业经济, 2016(8): 46~47.
- [99] 周刚, 张嘉琦. 基于旅游动机的老年旅游市场细分研究 [J]. 资源开发与市场, 2015, 31(12): 1540~1544.
- [100] 周向红. 从数字鸿沟到数字贫困: 基本概念和研究框架 [J]. 学海, 2016(4): 154~157.
- [101] 周向红, 王琳. 数字贫困维度分析及基于跨越视角的减贫策略 [J].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 2017(2): 98~102.
- [102] 朱海玲. 绿色经济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J]. 统计与决策, 2017(5): 27~30.
- [103] 朱环. 广西星级酒店数字平台建设研究 [J]. 企业经济, 2014(5): 131~135.
- [104] 邹统钎. 乡村旅游推动新农村建设的模式与政策取向 [J]. 福建农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 11(3): 31~34.

Rural Tourism in the New Era: A Reconsideration

XU Hong / WANG Caicai

(College of Tourism and Service Management,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350, China)

Abstract: The new era brings great opportuniti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as well as new demands and challenges. Based on the observation of rural new phenomena, this study puts forward the key issues of rural tourism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era. The present paper, at first, respectively analyzes rural tourism operation mode in the digital economy from subjects' digital poverty reduction and digital management of operation mode. Secondly, the paper explores rural tourism market development in the leisure economy from products innovation and market segmentation. Third, we discuss rural tourism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innovation economy from the entrepreneurial subject and opportunity, entrepreneurial form and effect, and entrepreneurial system and policy. Forth, we expound rural tourism poverty alleviation in the inclusive economy from the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alleviation, comprehensive poverty alleviation area and co-construction of poverty alleviation paths. Fifth, we analyz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in the green economy from the green production and green consumption. Then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rural tourism need realiz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resource view, and th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on of institutional view. Finall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an integrated framework of rural tourism. That is, rural tourism industry must rely on the supply and demand to promote each other,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supply and demand of rural tourism in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leisure economy. The combination of supply and demand drives the innovation economy, so it is necessary to study th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of rural tourism. The innovation promotes the realization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and rural tourism poverty alleviation will eventually promote the overal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thus we need to focus on problems of inclusive development and green development. This article is expected to promote the upgrading of rural tourism by deepening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strengthening practice application.

Keywords: new era; rural tourism; theoretical research